2014 年第 3 期
（第 13 卷）
华南农业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JOURNAL OF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SOCIAL SCIENCE EDITION）

西方叙事学本土化研究述评（1979—2013）

王 瑛

（华南农业大学 人文与法学学院，广州 广东 510642）

摘 要： 在西方文论本土化进程中，从最初的译介、理论应用和实践到理论创新，叙事学本土化最为重要的成就，体现在以下四个方面：其一，提出了多维度的中国叙事学的学科方向，其中赵毅衡提出的广义叙述学甚至第一次建构出其诗学框架，意味着叙事诗学理论进入一个全新境界。其二，中国学者提出了新的叙事学方法论，其中赵毅衡提出形式文化批评论主张深入文化深层探讨叙事形式问题；申丹提出的读者细读法可以解决叙事学在文本阐释的有效性问题；其三，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整理初见成效，中国传统叙事思想在赵炎秋和董乃斌等的努力下呈现出整体的历史样貌；其四，中国叙事学的空间意识个性已经发现，杨义对中国叙事学的早期构想可以为后来者提供参照。

关键词： 叙事学本土化；中国叙事；叙事学方法论；叙事思想；空间叙事

中图分类号： IO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0202（2014）03－0137－09

晚清以降，学界一直在致力于西方文论本土化。自 20 世纪 80 年代东渐的西方叙事学本土化可堪典范。无论从范畴辨析、中国叙事学学科方向、叙事学新方法论的提出以及中国叙事思想的挖掘和整理方面，叙事学研究在中国的成就已经值得书写和铭记。

一、叙事学本土化历程

西方叙事学经历了从经典到后经典的发展阶段，我国的叙事学研究自西方叙事学接受而来，视域宽广，尽管在文本分析方面经典叙事学的接受相对多些（作为一种便利的方法论工具，经典叙事学为文本的结构分析方面相当出色），但后经典时代的视野一直贯穿在我国的叙事学研究过程中。自 1979 年袁可嘉首次将叙事理论介绍到中国[1]，到 2013 年，叙事学在中国的研究，从最初的翻译介绍、理论的应用和实践，到理论的探索和概念的辨析以及本土叙事理论的整理和研究，中国叙事学建构的设想和努力，勾画出叙事学本土化的进程轨迹，中国的叙事学研究，正一步步迈向作为学科的叙事学的完善和作为中国的叙事学理论建构之路。

国内西方叙事学本土化进程可分为理论与实践两个方面。理论方面，主要体现在对西方叙事学的译介、理论介绍、范畴辨析、方法论建构、本土化的途径和思路以及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学等；实践方面，主要是应用西方叙事学理论对西方叙事文学、我国古典文学、我国现当代文学进行研究。

具体而言，对西方叙事学的译介，1980 年李幼蒸翻译的比利时学者 J. M. 布洛克曼的《结构主义》，是国内首部介绍结构主义的著作；1984 年起，国内译介西方叙事学的论文专著日渐增多，罗兰·巴特、列维·斯特劳斯、托多洛夫、热拉尔·热奈特等经典叙事学家的代表作陆续有了汉译本；

收稿日期： 2014－05－02

基金项目： 广东省十一五哲学社科规划项目（GD10CZW11）

作者简介： 王　瑛（1971—），女，江西信丰人，华南农业大学人文与法学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西方文论与叙事学。E-mail：wying716@scau.edu.cn

1989年出版的张寅德编选的《叙述学研究》比较全面地辑录了法国经典叙事学的经典论文和论著中的重要部分;2002年以后,主要以申丹教授主持的"新叙事理论译丛"系列译作介绍西方的后经典叙事学,2005年以申丹为主翻译的《当代叙事理论指南》介绍当代叙事理论研究成果、以及谭君强对荷兰叙事学家米克·巴尔《叙事学:叙事理论导论》的译介。

理论介绍方面:1979年袁可嘉在《世界文学》上发表《结构主义文学理论述评》,是我国最早介绍了叙事学的文章;1983年张隆溪在《读书》上发表《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首次以"叙事学"的名称介绍该理论[2];1990年,《外国文学评论》杂志开设"叙事学"专栏,赵毅衡、申丹等撰写系列论文介绍叙事学概念和观点。之后,国内学者开始撰写出版全面介绍西方叙事学理论的专著:1992年徐岱出版《小说叙事学》,1993年傅修延出版《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1994年罗钢出版《叙事学导论》、1998年赵毅衡出版《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2001年董小英出版《叙述学》,2004年胡亚敏出版《叙事学》、2008年谭君强出版《叙事学导论》、2010年申丹、王丽亚出版《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对西方叙事学的介绍由经典到后经典,逐步深入和完善。另外申丹的《叙述学与文体学研究》(1998)、《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2005)等都从不同角度介绍了西方叙事学理论。

范畴辨析方面:申丹、张世君、赵毅衡、黄秋耘、金人健、殷企平、罗钢、陈锡麟、周宪、王泰来、张寅德、王诺、赵一凡等在结合文本在范畴有效性方面取得了出色的成就。如申丹和赵毅衡"叙事"还是"叙述"的讨论,表明我国叙事学界对叙事学由浅入深的认识和思考。

方法论建构方面:赵毅衡在20世纪80年代就提出了形式文化批评论,认为相对于内容来说,形式更重要,主张在历史文化的具体语境中探求形式的生成和定型[3];2007年申丹在《外国文学研究》上发表论文《"整体细读"与深层意义———克莱恩"一个战争片段"的重新阐释》,首次正式在国内提出"整体细读法"[4],进一步消弭了叙事学在阐释具体作品时的软弱感,该著在方法论建构方面,是叙事学学科的里程碑式著作。

本土化的途径和方向方面:谭君强在《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一书中,提出审美叙事学的研究路径[5],2010年又著论文《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提出比较叙事学的设想,应用比较研究的方法在叙事学的框架内发展我国的叙事学研究[6]。2010年赵毅衡发表论文《广义叙述学》,提出建构总体意义上的叙事学理论[7]。2013年出版《广义叙述学》,全面建构广义叙述学学科理论和体系。赵毅衡的广义叙述学理论,显然已经超越"中国"和"西方"的视野,是叙事学学科领域的主要事件,标志叙事学学科跨上了一个新的台阶。熊沐清的《中国传统叙事理论与叙事学的相通和互补》、谢龙新的《叙事文化学的中国之路——从文化论视角切入叙事研究的回顾与展望》、刘亚律的《西方文论本土化的若干策略问题——以叙事学的中国接受为视角》,胡亚敏教授的《叙事学的过去、现在与未来》等论文,皆从不同角度对叙事学本土化提出了不同的研究路径和设想。

建构具有本土特色的叙事学方面:陈平原、杨义、傅修延、胡亚敏、谭君强等人在叙事学本土化方面做了开拓性的工作。杨义的《中国叙事学》从我国文化传统的角度初步建构了中国特色的叙事学理论;傅修延是"中国叙事学"的主要倡导者之一,其《讲故事的奥秘——文学叙述论》、《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叙事:意义与策略》、《文本学——文本主义文论系统研究》)等著作在研究我国叙事理论方面成就不俗。还有大量的学者在应用叙事学理论评析本土作品方面都做出了出色的努力。叙事学的研究已经超越了小说叙事,很多学者在跨媒介叙事研究方面做出的积极尝试,含有叙事元素的作品,如绘画、雕塑甚至茶艺等,都得到了关注。

在批评实践方面,有文学叙事研究和跨文学叙事学研究。文学叙事研究的版图有我国古典文学叙事研究,如高小康的《市民、士人与故事:中国近古社会文化中的叙事》、《中国古代叙事观念和

意识形态》、张世君的《＜红楼梦＞的空间叙事》、《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王彬的《红楼梦叙事》等古代文学叙事研究;王平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黄霖等著的《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中国现当代小说叙事研究,如陈平原的《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吴效刚的《现代小说:叙事形态与人本价值思想》、张闳的《感官王国——先锋小说叙事艺术研究》等;国外文学叙事研究如梁工的《圣经叙事艺术研究》、王长才的《阿兰·罗布格里耶小说叙事话语研究》。跨文学叙事研究有历史叙事研究,如潘万木的《＜左传＞叙述模式论》、刘宁的《＜史记＞叙述学研究》、以及新闻叙事学、电影叙事学等。

在中国传统叙事经验和叙事理论的整理和挖掘方面,除了傅修延《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之外,2012 年赵炎秋主编的《中国古代叙事思想》三卷本丛书和董乃斌主编的《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堪称中国叙事学领域研究的两件大事,二者分别从叙事史和文学史的角度梳理了中国古典叙事理论,勾画出一条虽然粗疏却相对完整的中国叙事理论的历史线索。这就为叙事学理论的中西对话提供了可以对话的一元,而非仅仅以西方叙事理论为圭臬为权威为主导来演说中国作品;也为叙事学本土化,建构中国叙事学提供了基础。

二、学科新方向构想

西方叙事学东渐以后,我国学者并不满足于被动接受西方叙事学的理论观点,也不满足于西方叙事学已有的分支学科,而是根据我国的叙事实践和研究者个人的学术视野,不断探索叙事学的新的理论生长点,提出新的叙事学研究方向。迄今为止,我国至少提出了五种叙事学的新方向,即叙事学与文体学相融合、审美文化叙事学、比较叙事学、空间叙事学、广义叙事学。

叙事学与文体学相融合。1998 年,申丹出版了《叙述学与文体学研究》,提出叙事学和文体学"应当互为补充"[8],虽然申丹没有明确为这种新的路径命名,但由于这种互补带来事实上的叙事学学科的新的拓展,本文把它作为叙事学研究的一个新方向。

申丹被认为是叙事学研究的中国代言人。到 2010 年为止,她先后出版了《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文学文体学与小说翻译》、《英美小说叙事理论研究》(合著、第一作者)、《叙事、文本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合著、第一作者)等专著。早在 1998 年出版的《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中,申丹就旗帜鲜明地标明了其研究的独特路径,叙事学与文体学的重合面给予申丹学术研究的灵感,不过,那个时候的申丹更多地是关注二者的形式技巧层面,提出要兼顾叙事学的"话语"与文体学的"文体"对小说的形式技巧进行研究。所以该著的重点在梳理叙事学与文体学的关系,强调二者虽然具有很大的差异,但在探讨小说形式技巧方面,二者可以互为对照、互相补充[9]。

审美文化叙事学与比较叙事学的研究向度,是叙事学家谭君强提出来的叙事学新方向。

比较叙事学。2006 年,车槿山撰文《比较叙事学的设想》,首次提出可以建构比较叙事学[10];2010 年,谭君强作出回应,提出"也许'比较叙事学'可以作为构建广义的'中国叙事学'之一途,并促使中国的叙事学研究在国际叙事学界占有一席之地"[6]。但比较叙事学也只是一个提出的概念,并没有真正形成分支学科。

审美文化叙事学的研究方式是对广义的叙述本文进行一种文化意义上的审美研究,强调对象研究的审美价值意义,为此,谭君强甚至把它称作审美叙事学。在坚持叙事学研究的框架之内,谭君强认为可以从相互关联的几个不同层面对叙事作品进行审美文化研究,即形式层面、社会历史层面、精神心理层面和文化积淀层面[11]。审美文化叙事学强调"审美"的特质,其对象必须是具有审美特性和价值的文化形态和产品。这一对象的界定突破了原有的文学虚构作品的界限,只要是

具有美学特质和价值的形态和产品,比如绘画、音乐、舞蹈、电影、电视、雕塑、书法等等,都可以纳入叙事学研究的范围。这是对叙事学研究发展现状在学理上的及时总结。

空间叙事学。在叙事学研究领域,龙迪勇一直勤力于叙事学的空间问题研究。从2003年对空间问题感兴趣迄今,他已经发表了相关研究论文11篇,其博士论文《空间叙事学》也是讨论叙事的空间问题。与赵毅衡相同的是,他认为叙事的根本问题是时间;不同的是,他认为空间问题具有独立研究的价值。

广义叙述学。2013年赵毅衡出版了《广义叙述学》一书,初步建构广义叙述学"一个可能有用的"诗学框架[12],意味着叙事学学科已经取得了质的突破,叙事学的历史,从经典、后经典,来到了广义叙述学的时代。叙述转向已经发生,原有的叙事理论已经不能满足叙事研究的需要,《广义叙述学》的出现,应和了叙事学在叙述转向之后的诗学要求。在这里,叙述的内涵扩大了,只要是一个符号链中的有组织有意义的时间性行动,都被认为是叙述。其次它处理了文学叙事和其它学科的关系,非虚构叙事已经正是进入了叙事诗学的领域;第三,它在诗学意义上建构了叙事学新的结构框架,即叙述的分类、叙述的基本构筑方式、叙述的时间和情节要素、叙述文本的主体冲突等。

三、方法论创新

"方法论创新"阐述我国叙事学本土化进程中提出的独特方法论。赵毅衡提出了文化形式批评方法,申丹提出了整体细读法。赵毅衡的形式文化论并不只是着陆在叙事学,申丹的整体细读法也不仅限于中国叙事实践。二者都可以广泛应用于具体文本阐释,具有方法论的普适性。

形式文化论的批评方法。它并不仅限于叙事学,但它的提出与叙事学研究有关,也在赵毅衡的叙事学研究实践中得到了很好的验证,所以也可以把它视作叙事学研究的方法论。

经典叙事学是典型的形式研究,形式就是它的一切,以至于董小英在其体系完备的《叙述学》中明确表示不能接受文化研究参与其中:"叙述学要做的是纯形式研究,是最大限度地探讨叙述方式的可能性。"[13]但赵毅衡认为形式研究根本不能脱离文化,形式与文化是互为表里。1985年赵毅衡完成《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该著出版的时间为1997年)后有"一个重要发现":叙事形式的意义,在于是文化的某种表征,只有深入一个民族的文化深层,才能对形式有更深入的认识和理解。"叙事学的形式分析就可以进行到文化形态分析的深度。"[13]244在这部论著里,可以窥见作者创用的形式文化论已经初具规模。1991年出版《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他发现,文学与文化存在深刻的矛盾,这种矛盾在叙述者身上得到集中的体现[14]234。其后赵毅衡对叙事学学科的思考,也一直经由形式深入到社会文化的深层。

在赵毅衡看来,文化是与社会生活相关的一切表意行为的集合。文学只是文化的全部表意活动中最为复杂的一种,规范文化的意识形态释义系统自然也会对文学进行规范。但"文学最根本的机制是更新语言,创造新的表意方式,它必然破坏既成的语言规范与意识形态规范,文学的生产与释义就很可能成为既定价值的挑战,就可能迫使'意识形态万能'这抛光的表面绽开裂缝"。那么,"文学批评的目的就是揭示意识形态与历史运动与历史运动的矛盾造成的文本扭曲。"[14]4-5

整体细读法是申丹提出来的一种全新的叙事学方法论。

与赵毅衡从文化的角度观照形式研究、谭君强从审美的角度观照叙事不同,申丹着力于文学文本潜文本的挖掘,她相信,文学文本具有多重内蕴的含义,即潜文本,它们隐伏在文本深处。那么,如何发现文学的潜文本呢?她在叙事学与文体学中发现了二者的互补性,并由此生发出一种新的作品阐释方法:整体细读法,"这种方法旨在打破阐释定见的束缚,以作品为本,仔细考察局部成分的内涵和全局作用,仔细考察作品各成分之间的相互关联,并将文内阅读与互文阅读相结合、

作品分析与语境关注相结合。”[14] 即“它以文本为基础,以打破阐释框架的束缚为前提。其‘细读’有两个特点:一是既关注遣词造句,又关注叙事策略。二是‘细读’局部成分时,仔细考察该成分在作品全局中的作用。……其‘整体性’主要体现在以下三个方面:一是对作品中各成分之间的相互作用加以综合考察;二是对作品和语境加以综合考察;三是对一个作品与相关作品的相似和对照加以互文考察。也就是说,‘整体细读’是宏观阅读与微观阅读的有机结合,两者相互关照,相互关联,不可分离。”[15]

在我国的叙事学研究中,方法论创新已经滞后于理论的建构,这将大大不利于叙事学本土化进程。那么,可以从哪些方面进行改善,达到方法论的新突破呢? 引进其他学科的方法论不失为后经典时代的通用法宝。可能更为关键的,还是诗学建构与方法论合一。这恰恰是我国的叙事学研究者做得很不够的地方。比较叙事学还只是作为一个问题提出,空间叙事学的研究已经有了一定的成绩,但更多的也只是以概念的梳理为主,审美文化叙事学对方法论只是有所提及,还没有形成完整的方法论,惟有叙事学与文体学结合的研究理路,申丹对整体细读法进行了较为详细的阐述,广义叙述学堪称典范,诗学建构与方法论化合在一起。也就是说,我国的叙事学研究在方法论建构方面还需要更多的投入,它直接关系到叙事学的本土化进程,理论的验证和固定、文本的阐释都急迫需要相应的方法论。

四、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史学钩沉

从研究对象看,对我国的叙事理论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文学叙事研究,文学叙事研究中偏向于古代文学部分,古代文学研究集中在小说叙事研究,小说叙事研究中偏向白话小说叙事,白话小说叙事研究又集中在(拟)话本小说和明清长篇小说。从研究的内容层面看,中国传统叙事理论研究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进行:一、整体研究。从整体观照的角度进行构建中国叙事学的理论探索;二、特色研究。对中国传统叙事理论进行阶段性的研究整理,力图勾画中国叙事理论的历史发展线索;三、个性研究,探求中国叙事理论建构的个性逻辑。

中国叙事传统是如何形成的? 其发展进程如何? 形成了哪些独具特色的叙事风貌? 哪些因素影响了我国叙事进程的发展成熟? 也许在现阶段来说,比建构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更迫切的需要,是对中国叙事传统和叙事理论的整理研究。

叙事进程的影响因素。我国叙事史上,除了文学叙事自身的发展要求之外,还有哪些因素影响了叙事进程? 哪些因素在叙事进程中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 我国学者在探究叙事进程的动态过程的同时,也对影响叙事进程的因素进行了探求。就本人目前所搜集到的资料来看,这些因素大致有以下这些:史传叙事、诗骚传统、意识形态等。

众所周知,与西方叙事早期发达的史诗和戏剧艺术不同,我国有着发达的史传叙事传统,从《春秋》的微言大义、《左传》的介入叙事到纪传体的《史记》和编年体的《资治通鉴》一路绵延下来,叙事手段愈来愈成熟,已经有不少论者对历史叙事展开了专门的研究,如潘万木的《<左传>叙述模式论》(2004)、刘宁的《<史记>叙事学研究》(2008),前者对《左传》的叙事特色和叙事模式进行了梳理,后者对《史记》的叙事立场和叙事技艺作了较为详细的探讨。有更多的学者注意到了史传叙事与文学叙事之间的关系,发现文学叙事深受史传叙事传统的影响,如赵毅衡发现小说叙事很长一段时间都在模仿史传叙事;王平发现中国古代小说中存在着一个“史官式”的叙述者[16];陈平原则发现即使是在中国已经有了很成熟的叙事文学历史的 20 世纪初,始终传统仍然是一个极为重要的小说叙事影响因素:“‘史传’之影响与中国小说,大体上表现为补正史之阙的写作目的、实录的春秋笔法、以及纪传体的叙事技巧。”[17] 史传叙事传统之于小说叙事的影响已经为学人所共

识。同样为大家所共识的是诗骚传统对小说叙事的影响。我国小说叙事有难以自持的诗词表达情怀,在讲述故事、评价人物、欣赏风景的时候,诗词歌赋便随处溢出。之所以说"溢出"是因为去掉这些诗词歌赋的部分并不影响叙事的效果,在小说中诗词歌赋与其说是为了表达的需要不如说是作者自我身份确证的需要。哪怕是话本小说中,说书人在讲述故事的时候还不忘诌一些有时候品质低劣的诗,以显示其格调的高雅。诗骚传统更集中的表现也许是在《红楼梦》中,作者直接把《红楼梦》写成了一部大诗,甚至可以称《红楼梦》为诗体小说,其格调氛围,无一不具诗的情趣、诗的韵味。陈平原《中国小说叙述模式的转变》中,探讨中国文学迅速由古代文学向现代文学的转变,指出除了西方小说的启迪之外,中国古典文学功不可没,现代小说或者对传统文学进行创造性转化,或者传统文体直接渗入小说中,或者在审美趣味中延续古典文学。

宗教作为一种意识形态,一旦为民众接受,往往很容易纳入到文学叙事的进程中,而且宗教为叙事带来的诸种新质在叙事进程的时间洪流中逐渐内化为自体因素,丰富着文学叙事的形态和内涵。实际上,人们对宗教之于文学的影响的认识由来有自。1989 年钱仲联在为蒋述卓的《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1990)作序时曾经说到:"以佛学阐说我国中古文学思潮者,莫先于沈寐叟……。绩溪胡氏,始以佛经翻译论述中古而还之文学,自是以降,以佛学与中国文学作比较探究者,不乏其人,而从佛经传译之进程以考较中古文学思潮,尚未之见。有之,则自蒋君述卓始。"[18] 在该著中,蒋述卓开创性地探讨了中古时期志怪小说与佛经故事之间的渊源关系、玄佛并用之于山水诗的兴起、齐梁浮艳藻绘文风与佛经传译以及北朝质朴悲凉文风与佛教之间的关系,这可能是我国叙事研究史上最早注意到佛教与叙事关系的探讨。在《志怪小说与佛教故事》中,蒋述卓探讨了佛教对于中古志怪小说的影响,认为这种影响的"途径和方式都是多种多样的,它对中国古代小说的发展和成熟起了很大的促进和刺激作用"。具体而言,蒋述卓认为,佛教对志怪小说的影响主要体现在两个方面,一是故事形式的影响,一是对艺术想象领域的开拓。

中国叙事传统的史学钩沉。2011、2012 年是中国叙事学研究的重要年份。早在 1999 年,傅修延为在《先秦叙事研究》中中国叙事思想的历史确定了最早的源头:叙事发轫于上古,至秦统一中国前叙事传统基本形成[19]。但对我国古典叙事理论作历史的整体描述,是在等待了整整十余年之后。2011 年、2012 年,赵炎秋和董乃斌分别主编出版了《中国古代叙事思想》丛书和《中国文学叙事传统研究》,前者在中国历史上第一次描述了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历史;后者立足文学叙事,勾勒出中国文学叙事历史的线索。尽管二者都认为他们只是做了最基础的工作,尽管赵炎秋以个案研究为特点的历史钩沉未免挂一漏万,尽管董乃斌以时间为经、文类为纬的宏伟架构还有一个更为宏阔的研究思路,但中国(文学)叙事思想的历史,已经有了全局性的描述了。叙事学本土化,最重要的还是"本土",本土叙事思想、叙事传统的挖掘整理,是本土化最为重要的工作。一直以来我们对西方叙事学的学习、借鉴和发展,沿用的是西方叙事诗学的发展理路,这当然是重要的工作。但本土化的目的,是建构中国叙事学。叙事学本土化应该是对话和激发,平等对话,激发我国叙事诗学的建构完成。

五、中国叙事诗学的初步构想

大部分学者认为,中国有着独特的文化传统、悠久的叙事历史和富有东方特色的叙事理论,中国完全应该而且能够建构属于我们自己的叙事学。1997 年,在对我国 2000 年历史的古典小说进行巡视之后,杨义拿出了《中国叙事学》,提出了中国叙事学的初步构想。

该著首先提出了建构中国叙事学的方法论:"还原→参照→贯通→融合。"[20] 其意是返回民族历史文化的原点,参照西方叙事学理论,贯通古今以及各种文体,融合中西,创造性地建立具有中

国特色的又充分现代化的叙事学体系。这种思路与西方文论本土化的思路是一致的,融合古今,对话中西,立足本土的理论和实践,西方文论应该经由一条由外而内的内化过程。这种思路得到了大部分学者的认同。但思想意识的成熟和思想具体化为实践之间还存在相当大的距离。杨义不仅提出了叙事学本土化的思路(这一条路线也适合西方文论的中国化),而且付之以实践,提出了"中国叙事学"的初步构想,这件事情的价值不仅是其理论智慧可以给予后来者以珍贵的经验和启迪,而且事件本身也是富有意义的。作为第一个构建"中国叙事学"理论体系的人,无论事后有多少聚讼纷争,他都具有开创者的意义。

但"中国叙事学"依然是个未完成时态,最为关键的因素,是中国传统叙事思想的个性需要进一步挖掘探索论证。

巴赫金说:"文学中艺术地把握了时间关系和空间关系的重要联系"即"时空体","时空体在文学中有着重大的体裁意义。可以直截了当地说,主题和体裁恰是由时空体决定的;而且在文学中,时空体里的主导因素是时间。"[21]西方叙事传统具有坚挺的时间艺术信仰,里蒙·凯南直言构成事件组成故事有时间就够了[22];对于西方叙事来说,时间是最重要的因素。中国叙事传统是否也如斯?西方思维逻辑严密性使西方叙事特别重视时间的线性逻辑;而中国的直觉思维传统是否也是以时间为第一要素?中国的古典小说叙事是否也更重视遵循时间逻辑?一直不是太被理论家重视的空间维度在中国古典小说叙事中承担了什么作用?无论是杨义所说的"圆形思维",还是傅修延所看到的"二合思维",与时间性相比,中华民族的思维特征似乎体现出了更多的空间性质素,这种质素对叙事产生了什么样的影响,形成了什么样的特征?时空体的另外一维——空间,已经得到我国学者的重视。如上文所述,龙迪勇已经在宏观上建构空间叙事学,有更多的学者,已经发现空间意识在我国叙事传统中的意义和价值。

杨义在《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发现空间和时间并驾齐驱。他发现汉魏六朝志怪小说的空间意识与幻想方式相辅相成,志怪小说作者受《山海经》和神仙家空间幻想的影响,在小说中构造殊域空间,如仙宫、洞穴甚至日常空间的变异,这些空间形态与遥远的时间一起,共同造成了志怪小说审美上的陌生感、神秘感和惊奇感。杨义在《世说新语》中发现了山水意识,在唐传奇中看见了梦幻世界、潜隐意识和变形艺术,在敦煌变文中划出了敦煌的地域特色,在《酉阳杂俎》和《夷坚志》中看出了时空错综的诗意,当然也明了《红楼梦》的时空结构。最出彩的是对中国人思维模式的构图——杨义认为是中国人的直觉思维是一种圆形思维——这也是一种空间思维形式。

1999 年张世君出版了《<红楼梦>的空间叙事》(1999),为我们展开了一个新的艺术视界:"本书研究《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特点,发现空间叙事是一个具有中国特色的叙事现象。"[23]

张世君发现《红楼梦》存在三种空间叙事层次:实体的场景空间、虚化的香气空间和虚拟的梦幻空间,三者共构,形成《红楼梦》叙事的架构。张世君该著的一个重要结论,即《红楼梦》突出的中国特色主要表现在空间感里。这个结论对于《红楼梦》研究来说是一个重要的发现,对于叙事学研究来说,也是一个极为重要的观点。它可能会翻转人们对于中国古典小说叙事的看法,甚至翻转人们对小说叙事的看法。一直以来人们习惯了在时间之维中耙梳求索小说叙事的奥秘,也许,从这里开始,小说叙事的另一个表情——空间的腾挪变换会引起人们更大的探究兴趣。

《<红楼梦>的空间叙事》的这个结论是否适合中国所有的叙事文学呢?中国叙事文学的特色是否也体现了强烈的空间维度,或许《红楼梦》只是一个个案,空间叙事特色只是独特的"这一个"?在《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2007)中,张世君对中国文学叙事的空间维度研究有了新的进展,通过对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的仔细耙梳,她发现中西小说叙事的一个重要差别:"空间叙事是中国文学叙事的一个逻辑起点,也是中国叙事概念的文化生成。""时间叙事成为西方文学

叙事的一个逻辑起点,也是西方叙事观念的文化生成。"[24]这个结论的意义是历史性的:一方面它提醒人们重新审视中国两千多年的叙事历史,一直没有引起足够重视的空间之维也许就是解开中国叙事艺术奥秘的钥匙;另一方面它提醒西方叙事理论之于中国叙事理论的根本差别在于逻辑起点和文化生成的一为时间叙事一为空间叙事,西方叙事理论可以成为中国叙事理论研究的参照但中国叙事理论自有其独特的理路,中国叙事学的建构可能还要以叙事的空间之维为基础。

年轻的学者韩晓提出了空间叙事基本框架,她的研究对象是古代文学的空间叙事。在《中国古代小说叙事三维论》(2009)中,韩晓负责撰写了中卷《空间论》,对中国古代空间叙事理论提出了一个基础框架。尽管这个框架有些问题还值得商榷,笔者认为,它的意义不仅仅在于这个框架的内容是什么,而是在于提出框架这件事实本身,它标志着中国古代空间叙事理论建构事实上的可能性、可行性以及中国学者建构中国叙事学的能力。

正如张世君所说,空间也许是我国叙事传统的文化逻辑起点,作为与西方叙事对时间意识的逻各斯强调迥然不同的意识形态,空间可能是我国叙事传统中最有特色的叙事意识形态。中国叙事学的建构,也许可以从这里突围。

西方叙事学本土化是有积极的成果的,在我国,叙事学新的研究方向已经提出,叙事学与文体学结合的理路、审美文化叙事学、比较叙事学、空间叙事学、广义叙事学等新的学科方向都结合了叙事学发展的趋势、文学实践和研究者个人的理论视野,有的方向甚至在文本分析方面作出了精彩的范例,可用于文本有效阐释的叙事学方法论业已成熟。赵毅衡提出的形式文化论和申丹提出的整体细读法都可用于阐释具体文本,弥补了西方叙事学在文本阐释方面的缺陷,中国叙事传统异质于西方叙事传统的逻辑起点已经发现,与西方叙事坚定的的时间艺术信仰不同,空间叙事才是我国叙事艺术的逻辑起点。中国叙事学也出现了其早期构想的理论形态,杨义《中国叙事学》尽管还有很多遗憾,但他毕竟让我们看见中国叙事学建构最后完成的曙光。叙事学本土化进程,是一个创造历史的过程。一部中国叙事学的大书,正在被书写。

参考文献:

[1] 袁可嘉. 欧美现代派文学的创作及理论[J]. 华中师范学院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79,(6):54-65.

[2] 张隆溪. 故事下面的故事——论结构主义叙事学[J]. 读书,1983,(6):107-118.

[3] 赵毅衡. 当说者被说的时候:比较叙述学导论[M]. 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7:前言 II.

[4] 申 丹. "整体细读"与深层意义———克莱恩"一个战争片段"的重新阐释[J]. 外国文学研究,2007,(2):31.

[5] 谭君强. 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37-243

[6] 谭君强. 比较叙事学:"中国叙事学"研究之一途[J]. 江西社会科学,2010,(3):37.

[7] 赵毅衡. "叙述转向"之后——广义叙述学的可能性和必要性[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90.

[8] 申 丹. 叙述学与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9.

[9] 申 丹. 叙述学与小说文体学研究[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4:前言.

[10] 车槿山. 比较叙事学的设想[J]. 中国比较文学,2006,(2):34-36.

[11] 谭君强. 叙事理论与审美文化[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237-243.

[12] 赵毅衡. 广义叙述学[M]. 成都:四川大学出版社,2013:17.

[13] 董小英. 叙述学[M]. 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15.

[14] 赵毅衡. 苦恼的叙述者——中国小说的叙述形式与中国文化[M]. 北京: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1994.

[15] 申 丹. 叙事、文体与潜文本——重读英美经典短篇小说[M]. 北京: 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 13.

[16] 王 平. 中国古代小说叙事研究[M]. 石家庄:河北人民出版社,2001:10-19.

[17] 陈平原. 中国小说叙事模式的转变[M]. 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3:212.
[18] 蒋述卓. 佛经传译与中古文学思潮[M]. 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1990:序 1.
[19] 傅修延. 先秦叙事研究——关于中国叙事传统的形成[M]. 北京:东方出版社,1999:6.
[20] 杨　义. 中国叙事学[M]. 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7:34.
[21] 巴赫金. 小说的时间形式和时空体形式——历史诗学概述[M]//巴赫金:小说理论,白春仁 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274 - 275.
[22] 里蒙·凯南. 叙事虚构作品[M]. 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33.
[23] 张世君.《红楼梦》的空间叙事[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5.
[24] 张世君. 明清小说评点叙事概念研究[M]. 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207 - 208.

Review on the Loc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Narratology (1979 - 2013)

WANG Ying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Law*, *South China Agricultural University*, *Guangzhou* 510642, *China*)

Abstract: In the localization process of Western literary theory, the localization of narratology has demonstrated Chinese scholars' wisdom and achievements from translation and introduction to theory practice and innovation. The most important achievements are: first, new academic discipline directions have been put forward, among which the Generalized Narratology put forward by Zhao Yiheng, for the first time constructed its poetics framework which marks a new era in narrative poetic theory; Second, Chinese scholars put forward new methodology, eg, the Forms-Culture Criticism, proposed by Zhao Yiheng, advocating a deep culture exploration when probing the narrative form; another example is the Overall-Extended Close Reading methodology put forward by Shen Dan; Third, study on 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thoughts has achieved some initial success, with the efforts of scholars such as Zhao Yanqiu and Dong Naibin, the overall history look of Chinese traditional narrative thoughts has emerged; Finally, spatial consciousness personalities in Chinese narrative tradition has been shown, and the early concepts about the Chinese Naratology put forward by Yang Yi can provide reference for latecomers.

Key Words: localization of the western narratology; academic discipline direction of narratology in China; narrative methodology;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s of narrative; spatial narrative